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3002

后人类时代生态美学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

——程相占教授访谈

龙其林^{1,2}, 董笑¹, 赖宁娜¹, 郭丽斌¹, 李帅¹, 宋曦阳¹

(1.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40; 2. 海德堡大学 跨文化研究中心, 德国 海德堡 69117)

摘要: 针对访问者提出的有关后人类时代生态美学发展的多个问题, 程相占教授基于其生生美学理论进行了解答。关于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如何避免“以西释中”的陷阱, 他认为优秀的西方理论具有超越性, 我们可借鉴, 但需避免生搬硬套, 中国学者应挖掘自身理论独创性; 关于如何激活古典生态美学资源, 他提出了“还原-阐释-转化-发展”四层次法, 倡导对古典生态美学适度阐释, 避免随意贴标签; 关于生态美学的未来, 他提出应以生态实在论为哲学基础, 构建包容性逻辑框架, 整合多种立场; 关于生态美学在城市规划、新农村建设中的应用, 他强调其引导新型审美观的重要性, 认为生态审美教育有助于推动环保生活方式的实践; 关于如何面对后人类主义浪潮, 他提出了生态人文主义与后人类主义的贯通思路, 认为生态美学在赛博格时代依然必要, 但其发展必须借鉴当代科技成果; 关于如何创造城市生态文学, 他认为应围绕无地方性、城市生态学与环境公正这三个关键词进行深入思考与实践。

关键词: 程相占; 后人类时代生态美学; 生生美学; 古典生态美学资源; 生态实在论; 生态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 B8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6)03-0010-09

Key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in the Post-Human Era: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Cheng Xiangzhan

LONG Qilin^{1,2}, DONG Xiao¹, LAI Ningna¹, GUO Libin¹, LI Shuai¹, SONG Xiyang¹

(1.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2. Center for Intercultural Studies, Heidelberg University, Heidelberg 69117, Germany)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multiple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interviewer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in the post-human era, Professor Cheng Xiangzhan provided answers grounded in his theory of Sheng Sheng Aesthetics. Regarding how to draw upon Western theories while avoiding the trap of “interpreting Chinese concepts through Western lenses”, he argued that outstanding Western theories possess transcendent value and can be referenced, but we must avoid rigid application.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instead explore the originality inherent in their own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n revitalizing classical ecological aesthetic resources, he proposed a four-tiered approach of “reconstruction-interpretation-transformation-development”, advocating for measured

收稿日期: 2025-1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全球化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书写研究”(22FZWB084); 海德堡大学“从全球视角建构世界”研究奖金“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中的社会环境与人民生活”(2304578)

作者简介: 龙其林, 男, 湖南祁东人,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海德堡大学研究员,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ecological aesthetics while avoiding arbitrary labeling. Regarding the future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he suggested establishing ecological realism as it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constructing an inclusive logical framework, and integrating diverse perspectives. Regarding ecological aesthetics' application in urban planning and new rural construction, he emphasized its role in guiding new aesthetic perspectives, asserting that ecological aesthetic education promotes eco-friendly lifestyles. On confronting the post-humanist wave, he proposed integrating ecological humanism with post-humanism, arguing ecological aesthetics remains essential in the cyborg era while incorporating contemporary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Regarding the creation of urban ecological literature, he proposed that it should be developed through deep reflection and practice centered on three key concepts: placelessness, urban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Keywords: Cheng Xiangzhan; ecological aesthetics in the post-human era; Sheng Sheng Aesthetics; classical ecological aesthetic resources; ecological realism; ecological humanism

龙其林: 任何时代的文艺作品都有其独特的形成与发展环境,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形成了独具特质的审美思维, 因此鉴赏中国文艺作品也必然应以生长于斯、深谙其神韵的中国评论话语为主体, 在创作与评论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深度对话。改革开放之后,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与作品被全面引进、移植到国内, 西方话语凭借其科学性与系统性, “鸠占鹊巢”般地占据了“中国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的要地。一旦缺少了西方理论与话语, 不少学者几乎就不会评价作品了, 套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曾经并且至今仍是“中国文艺评论界”一大怪象。这种现象在中国生态批评界也比较突出, 不少批评者习惯于借用甚至是套用西方生态理论阐释中国作家作品, 不顾中国作家是否受到西方生态理论影响, 结论前置, 强行阐释。您觉得应该如何解决套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生态文学作品的问题?

程相占: 谢谢其林组织了这次访谈。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 又是一个历史问题, 理论和历史又是交织在一起的。先从历史的角度来说,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的“古今中西”之争的又一次体现。从 20 世纪之初开始, 中国就开始大量引进西方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了, 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作品就是在这样的语境和参照下向前发展的。文艺理论的古今之争实质上是古代文论如何在西方文论的冲击下实现其现代转化和发展的的问题, 同时也是中国当代学人如何以古今中西的文论为资源进

行当代创新的问题, 古今之间(之争)隐含着中西之间(之争)。你想说的问题的实质就是: 西方生态批评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来解读和评论中国文学作品?

从学术史角度说,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这个术语首先出现在西方, 是由西方学者于 1978 年率先创造的。西方学者还创造了一系列生态批评术语, 比如环境批评、环境公正、慢暴力、新物种主义、行星视野、生态中心论等等。就生态学科而言, 西方学者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生态诗学、生态叙事学、生态现象学、生态心理学、生态语言学、生态符号学、生态人文学(环境人文学)等。我带领 20 多人共同完成的 70 多万字的《生态批评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 2025 年版)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上述理论问题。你也是这本书的作者, 负责第九章“地球话语与生态文学研究的行星视野”的撰写。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学术事实: 西方学者突出的理论独创性值得我们重视, 也值得我们学习。当然, 我们中国学者其实也有很多独创的理论。我过去几年应西方学者之邀, 分别为《牛津环境科学研究百科全书》撰写了“中国环境美学”词条, 为《劳特里奇自然与环境美学》撰写了第十四章“当代中国生态美学”, 为《人类世百科全书》撰写了“中国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词条。在撰写过程中, 我关注的焦点一直是中国学者的独创性, 我们一定要把中国学者独创的理论术语、理论命题和理论主张介绍给国际学术界。中国学者独创的术语也有不少, 比如精神生态(鲁

枢元)、生态存在论(曾繁仁)、生生美学(程相占)、生态智慧C(程相占)等。但总体上来说,中国学者独创的理论成果还不是很多,对西方学术界的影响还比较有限。

在上述背景基础上,我就可以正面回答你的问题了:首先,西方文艺理论只要是富有学理深度的优秀理论,就可以用来解读中国文学作品,就像德国制造的锅可以用到中国的厨房中做地道的中餐那样。优秀的理论具有超越性,其可以超越时代、超越国界、超越民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固守中国本位。你所说的“结论前置,强行阐释”这种现象,不是西方文论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有些学者没有把理论理解透、没有把理论运用好,理论运用还停留在生搬硬套的初级层面上;其次,中国学者对中国的生态批评理论未必很熟悉、很重视,贵远贱近甚至崇洋媚外的心态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第三,西方学者是否会接受、会运用中国理论,还要假以时日、冷静观察。我和我的博士生汤越为《鄱阳湖学刊》的“生态名家”做了一组稿件。汤越的文章题目是《程相占生态美学的理论创新及其国际影响》,其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你了解中国生态美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情况。

我于2001年首次提出“生生美学”。最近,我用它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搜索了一下,发现不少文章开始运用生生美学去解读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甚至景观设计。这让我感到很开心。我相信曾繁仁先生讲过的一句话:“生生美学具有无穷的生命力。”^[1]

在这里,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我跟汪树东教授的一次聊天。当我们聊到是否可以运用西方生态批评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作品时,树东说:“我也想用中国理论啊,关键是,有吗?”这句话对我冲击很大。作为一个侧重生态理论研究的学者,如何创造出值得国内外学者广泛运用的理论,一直是我的心结,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和目标。生生美学或许是比较成功的创新案例,但其理论体系还不完备,我依然在想办法深化它、完善它。当然,这需要学术同仁的通力合作。

龙其林: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如何避免“以西释中”的陷阱,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与美学体系是学界共同的挑战,已经有一些

学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他们力图从中国古典文化中寻找生态批评的精神资源,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生态批评的基础理论多借鉴自西方,如何结合中国古典生态智慧构建本土话语,仍是未竟之业。一些学者提出了具有本土色彩的生态批评话语,但这些话语在阐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时经常显得乏力且牵强。部分研究将古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理念简单等同于现代生态思想,忽视了古代文学中自然书写的审美趣味与士人理想,导致生态批评的深度与批判性不足。部分研究将传统思想,如儒家“仁民爱物”等,简单地贴上“生态”标签,却未能揭示其与现代生态美学的内在差异与关联。在您看来,如何才能充分激活古典生态美学资源,进而将其凝练为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态美学话语?在这个过程中,又如何避免将古代朦胧的、朴素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强行“发掘”出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意义?这似乎从一开始就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困难。

程相占:如果说上面讨论的问题是“以西释中”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以今释古”的问题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过去30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1998年,我申请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古代文心论的现代阐释”,最终成果是专著《文心三角文艺美学——中国古代文心论的现代转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23年再版时将书名修改为《中国古代文心论的现代阐释》。我写在“再版后记”中的如下两段话,可以引用过来回答你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应该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简称“双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应该说,这是非常精辟的论断。

中国古代文心论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文论传

统,我当时就想借助当代语言哲学和文艺美学的视野对之进行现代阐释,在阐释的基础上建构出符合当代需要的文艺美学理论。这本书建构的标识性术语有两个,一个是“文心三角”,另外一个“生生美学”——全书的“结语”就是“走向生生美学”。前者至今仍然沉寂在这本书当中,没有引起学术界的任何注意;后者的命运则要好很多,我本人于2012年出版了《生生美学论集——从文艺美学到生态美学》(人民出版社),学界前辈曾繁仁先生从2017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生生美学具有无穷生命力》(10月20日17版)开始,在很短的时间内发表了一系列以“生生美学”为题的文章,大力倡导“生生美学”,并且于2021年出版专著《生生美学》(人民出版社)。客观地说,“生生美学”的提出和发展,为中国传统“生生”思想的“双创”提供了一个比较成功的个案。我一直坚信,古代文论研究应该分为四个层次:还原、阐释、转化、发展^[2]。

张江先生提出的“强制阐释”不仅可以用来批评“以西释中”,同样可以用来批评“以今释古”。我特别反感学术界的一些做法:当觉得“生态美学”好的时候,中国古代美学一下子就成了“生态美学”;当觉得“生生美学”好的时候,中国古代美学一下子又摇身一变成了“生生美学”。我觉得这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而是随意地贴标签,除了制造不必要的理论混乱、制造学术垃圾之外,我看不到任何正面的价值。作为当代人,我们无论如何努力,也只能站在当代人的立场上去反观古人,“以今释古”是无法避免的阐释学壁垒,关键是要掌握好“阐释策略”和“阐释度”。就“阐释策略”而言,适度阐释的前提必须是“还原”,一定要按照历史客观性原则,最大限度地搞明白古人的原意;然后,要从学理上讲清楚当代视野和古代文献之间的内在关联,对当代视野必须做到心领神会,而不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做到了上述两点,“以今释古”的弊端基本上就可以避免了。我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最常用到的一个句式是“A与B的联系与区别”。比方说,我经常讲“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联系与区别”。套用到你这里提出的问题上,就是“古代美学与当代生态理论的联系与区别”。讲清楚“联系”,是为了讲明白阐释的合法性;讲清楚“区别”,

是为了讲明白古今之别,避免随意贴标签。

要想激活古典生态美学资源,进而将其凝练为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态美学话语,还要在上述“还原”与“阐释”两个层面上,将其进一步上升到“转化”与“发展”两个层面。“转化”近似生命体的“消化”。我常跟学生开玩笑说,我们吃牛肉不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上长出一块牛肉来,而是要把牛肉消化吸收,转化为我们续命的能量;写文章的时候断章取义、寻章摘句,就是吃块牛肉就把牛肉长在了胳膊上。四个层面当中,“发展”是最高层,也是最终的学术目标。我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发展当代中国美学,从而续写中国美学史,让五十年、一百年、一千年后的后人,能看到我们当代学人的美学理论创新。我觉得我的“生生美学”就是按照这四个层面创造的理论形态,至于它能否流传后世,那要看它的学术命运好不好了。

董笑:您在《生态美学引论》中提到生态美学是响应时代呼唤而产生的美学形态,请问在当前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生态美学的理论基础有哪些新的变化,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程相占:这个问题比较大,因为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美学内容很多,不是几句话就能够介绍清楚的。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生态美学的八种立场及其生态实在论整合》,我把国际生态美学划分为生态学立场、生态艺术理论立场、现象学立场、生态美立场、生态存在论立场、生生本体论立场、实践美学立场、生态型美学立场等八种立场。除此之外,国内还有曾永成先生的“人本生态美学”,还有我的老同学袁鼎生提出的“美生学”。你从这些立场的名称上,大体上可以感受到生态美学的理论基础的变化。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自己提出的“身-心-境”三元范式,我也一直想在这个范式的基础上构建出一套生态美学原理,但进展很缓慢,因为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并不难,但原理的探讨是非常不容易的。生态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不同的学者肯定有不同的看法。我的看法是,以生态实在论为哲学基础构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生态美学逻辑框架,将各种立场的核心命题与关键词有机地会通与整合起来,从美学原理的层面推进生态美学研究。

董笑:您在《生态美学引论》中详细讨论了生

态美学与西方环境美学的关系,并提出了生态美学中国话语的建构问题。您认为生态美学中国话语的独特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在国际学术对话中发出中国声音,同时又能与中国本土的生态实践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理论呢?

程相占:我曾经提出,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是指中国学者在参与国际生态美学构建的过程中运用中文所生产的学术话语,其四个关键词分别是生态文明、生生本体、生态存在、生态审美。这些关键词都是西方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所没有的,其逻辑关系构成了中国生态美学话语的大致轮廓。这是十年前的看法,现在看来还需要斟酌一下。比如,“生态文明”这个术语最早是由西方学者在1978年提出来的,但西方的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术语。我的学长李庆本教授有句话讲得很好。他说,术语不是话语。的确,作为话语的“生态文明”的确只出现在中国生态美学当中。另外,“生态存在”中的“存在”一词其实来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是西方术语,但到了中国变成了中国生态美学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心目当中最严格、最理想的“中国生态美学话语”,应该用中国学者创造的术语来构建的话语。要想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理论”,我采用的方法是“以生态审美问题为导向的古今中西互动诠释”,我试图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最终能否成功,要看自己的创造力如何。我现在经常觉得力不从心,或者说心有余而力不足,希望在你们年轻人身上。

董笑:您著作中提到生态美学对于引导人们形成新型审美观的重要性。请问在推动人类生活方式向更加环保和可持续的方向转变的过程中,生态美学能发挥哪些作用?具体而言,请问在城市规划、新农村建设和经济建设中,如何应用生态美学去助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

程相占:生态美学是一种理论,它发挥作用的途径有两条:一是被城市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等领域的学者接受,成为他们的理论指导。至于说如何应用,那要看这些领域的学者如何领会生态美学,如何与他们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了。我的朋友圈中有一大批这些领域的学者。我们每年都会一起开会,探讨生态智慧与城乡生态实践之

间的关系。我在会上都是在讲生态美学、生态艺术学,他们也都表示感兴趣。当然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明确跟我说,他做规划、做设计的时候采用了我的生态美学理论。我相信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很多情况下,生态美学是作为设计理念的意识背景发挥作用的。我和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城市规划设计师王昕皓教授合作发表过一篇英文论文,题目是《生态美学对城市规划的贡献》^[3],你要是感兴趣可以找来读读。另外,我还与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的高伟教授合作发表了《营境以致善境:生态美学与善境伦理双重视野下的城市规划》^[4],也可以用来回答你的问题。如何用生态美学理论助力规划设计,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可以作为案例来研究。他提出的“大脚美学”其实就是“生态美学”,只不过他从来不用“生态美学”这个术语罢了。他依据“大脚美学”理念在国内外设计了很多景观作品,有些很成功。

二是进行生态审美教育,不仅仅是在学校进行,而且是在全社会进行。两年前,我就与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孙墨青编辑商定,计划编写一本《生态美育教程》,写作团队已经组建起来了,我们将择机启动编写工作。我觉得,生态审美教育是推动人类生活方式向更加环保和可持续方向转变的重要途径。

赖宁娜: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话语系统,毫无疑问是以传统美学思想为根本出发点的,也需要借鉴和吸收国外生态美学成果,但是,正如您所说“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生态美学”二者具有各自独特的发展历程,是两种不同的事物,您觉得二者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您是如何处理二者的差异?

程相占:中国生态美学的内容很多,西方生态美学的内容也比较丰富。要说最大的不同,我觉得中国生态美学非常自觉地将理论建构与生态文明建设密切联系起来,非常自觉地将生态美学作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动力。这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西方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基本国策和大政方针。我在处理中西方生态美学差异的时候,自觉地从生态文明视野出发反思生态美学的核心问题、基本思路和学术立意,意在将中西方生态美学的核

心问题整合进来, 建构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框架。当然, 这项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

赖宁娜: 如果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 中国生态美学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 正式提出是在 1994 年, 其甚至一度被认为是中国首创的。从您的《生生美学论集》中, 我们领略到了中国古典文论中生态智慧的博大精深, 而且西方著名的生态著作《寂静的春天》1979 年就传入中国, 但为何生态美学的概念直到 20 世纪末才有学者提出来?

程相占: “生态美学”(ecological aesthetics) 这个术语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米克于 1972 年提出来的, 但中国学者一直不知道, 因为大家没有读到他的那篇文章, 我应该是最早向国内介绍那篇文章的学者。《寂静的春天》是一部文学作品, 里面的生态思想可以作为建构生态美学的资源, 但它本身并不是生态美学论著。至于说为什么中国学者没有比西方学者更早地提出生态美学概念, 那大概是因为中国社会过去几十年一直在追求现代化, 对于生态问题的关注比较少。当然, 这仅仅是社会原因。至于说美学方面的原因, 大概是因为实践美学的影响太大了吧。李泽厚实践美学所秉持的人与自然关系观是反生态的。对此, 我在相关论文中做过反思和批判。

赖宁娜: 生态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 生态美学与人的审美体验密不可分, 但也有一个观点是, 随着科技的发展, 原本属于人类文明内核的人文主义将被数字技术取代。您认为, 面对后人类主义浪潮, 生态美学如何应对? 赛博格时代是否还需要生态美学?

程相占: 人文主义对应的是英文 humanism, 这个术语又可以翻译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 而从字面上来说就是“人类主义”。我觉得“人类主义”这个译名挺好的, 因为它可以更加直接地对应“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后人类主义最为重视技术对人的影响。比如, 最近火热的 AI 提出的哲学问题是: AI 是否可以作为主体? 有人就从人机互动的角度提出“双主体”概念, 认为人和 AI 都是主体。我是个技术盲, 对后人类主义不敢多说什么, 但我觉得它有比较明显的生态意蕴, 那就是对现代哲学主体性的反思、批判和超越, 这和我在建构生态美学时坚持的“生态人文主义”是一致的。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我觉得赛博格时代需要生态美学, 生态美学也需要从后人类主义那里借鉴对于科技的思考, 将科技作为生态系统当中的重要因素来考虑。

郭丽斌: 您在《生态美学引论》中提到美学和生态学的关联。生态美学源于生态学、文学和美学的学科交叉, 请问生态美学的跨学科发展路径和方法有哪些? 中国生态美学在此基础上有哪些自己的创新? 您如何看待生态文学中的审美与审丑?

程相占: 就跨学科这个问题来说, 我首先跟你分享一个学术理念: 以问题统领学科, 而不是以学科分割问题。我上面提到了我的生态美学研究方法论纲领, 那就是“以生态审美问题为导向的古今中西互动诠释”。这就意味着, 我所关注的核心是“生态审美问题”, 凡是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的知识都会被借鉴和吸收。这个时候, 我认为学科无边界, 我们决不能画地为牢、作茧自缚。中国生态美学在跨越美学和生态学两个学科的时候, 最大的理论创新是创造了“生态审美”这个术语, 这也是我的生态美学最重要的关键词, 我甚至认为“生态美学”就是“生态审美学”。生态文学给我提供的主要是生态审美体验, 这是我建构生态美学的灵感源泉。我在讲美学概论或美学原理的时候坚持, 不能从动宾词组的意义上理解“审美”以及与之相伴生的“审丑”。按照我讲的美学原理, 你想说的“审美”应该是“对美的对象的审美欣赏”, 而“审丑”应该是“对丑的审美对象的审美欣赏”。审美对象的美丑之分来自传统的审美观, 但如果你养成了生态审美观, 原来你认为的那些“美的审美对象”未必就会那么美了, 反之, 你原来认为的那些“丑的审美对象”也未必那么丑了。一句话, 人们的审美观是随着时代发展变化而变化的, 生态美学倡导人们形成生态审美观。如果你想真切地体会生态审美观, 建议你去湿地公园走走。湿地公园与传统的风景区不同, 它的很多审美对象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的”或“丑的”对象, 而是基于生态视野的“具有魅力的”对象。所以, 我不太喜欢“生态美”这个术语, 我自己倡导的术语是“生态魅力”。当你从湿地公园感受到生态魅力的时候, 你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就会豁然开朗了。

郭丽斌: 您的《生生美学论集》中提到了中国

传统经典的生态智慧,请问在后人类时代,生态美学如何与后人类理论对话?生态美学的发展方向指向哪里?

程相占:这个问题跟前面赖宁娜同学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基本上是一样的,你可以参考一下。既然你提出来了,我就再讲几句。我在建构生态美学时提出的“生态人文主义”,表明生态美学绝非李泽厚先生所批评的“无人美学”,它依然是“有人的美学”,关键在于“人”的内涵如何界定。我相信,后人类主义也并非真的“无人”,它真正的核心是:在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语境下,人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异?呈现出哪些新的形态?这一核心关切,与我所倡导的生态人文主义的思路其实是基本一致的——毕竟康德的批判哲学最终落脚于“人是什么”的追问,而我们探讨后人类主义,本质上也还是在延续这个根本问题。中国生态美学区别于西方生态美学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生态人文主义为核心思想纲领。我曾经将生态人文主义界定如下:在继承现代人文主义重视人的能力、尊严和精神自由的基础上,根据生态学原理重新阐释人类天性,将人类界定为置身于地球生态系统之中、位居生物链和食物链顶端、具有反思意识和能力的独特物种,其生态位是维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健康、稳定和美。基于这个定义,我提出了一个理论命题,将之视为生态美学的理论基点:“植根于生态系统之中的具身的心灵”(embodied mind in ecosystem)。这个命题试图把身体美学、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贯通起来:“具身”(embodied)对应身体美学对“身体”的重视;“生态系统”(ecosystem)关联环境美学的“环境”维度,将环境理解为生态系统。二者的结合,正是生态美学的核心关切。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国内学界通常将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审美活动”,但根据生态学的经典定义,我更倾向于将美学的研究对象概括为“审美互动”。这是对“具身的心灵”与生态系统关系的呼应,其更贴合生态学定义中“有机体与环境持续互动”的核心逻辑。

建构生态美学的最终目标,不止是让人类摆脱生态危机而幸存,更关键的是要让人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而这个目标,恰恰需要通过生态人文主义与后人类主义的贯通来实现。二者贯通

的焦点,其实还是回到“humanism”的译法与内涵上。我尝试借鉴海德格尔“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的思路,但考虑到中国古代哲学中“天”的超越性维度,以及后人类主义的技术语境,我将其调整为“天地人机四方游戏”。“天”“地”对应生态系统的自然维度;“人生天地间”,“人”是生态人文主义界定的“具身的心灵存在”,“机”则呼应后人类主义最关注的技术形态——通过这四个维度的互动,既保留生态人文主义的“生态共生”,又接纳后人类主义对“人的新形态”的思考,最终实现二者的理论融合。

郭丽斌:请问程老师,生态美学与科学技术有着怎样的关联?生态美学对科学技术的反思有哪些?其独特性有哪些?生态美学与科幻文学如何关联?

程相占:我刚才说了,我是个技术盲,在编写《美学概论》教材和讲美学课的时候,我通常将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技术美”理解为“借助科技创造的审美形态”;我认为“技术美”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为科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自身没有美丑与否的问题。我总觉得技术是中性的工具,人类既可以用来行善,也可以用来作恶。科幻文学的思想主题很多,据说有些科幻作品具有很深的生态意味,这些作品用科幻的方式探索人类如何克服生态危机,如何走出危机、走向未来。比如,电影《流浪地球》就有比较浓厚的生态意味,可以视为生态意识的影视表达。一句话,当我们解读科幻文学的时候,可以运用生态美学作为理论工具去解析。

宋曦阳:关于城市与生态的问题,在您的专著《生态美学引论》中,您提出了“生态智慧C”概念,并强调了中国文化背景在生态美学中的重要性。请问我们如何将生态智慧C的理念应用于城市规划和建设中,以实现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城市化进程迅速的国家,您认为生态文学和生态美学在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方面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程相占:我在回答前面董笑同学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时,基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生态智慧C与我参与的“生态智慧学社”微信群关系比较密切。同济大学象伟宁教授建立了这个群,群里的成员目前有493人,绝大部分“社员”来自城市规划、

建筑、景观设计、风景园林等领域,我们共同的目标是将生态智慧作为城乡生态实践的理念和理论基础。举个例子吧。2025年7月,我参加了“生态智慧与城乡生态实践”同济-长江大学论坛(2025)。论坛征稿当中有如下两段话,我摘录下来,你一看就明白了:

论坛背景:生态文明建设是国之大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智慧与生态实践之同济宣言》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发布于2016年7月同济大学举办的首届“生态智慧与城乡生态实践”论坛,旨在建立生态智慧与生态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将生态智慧与生态实践的学术研究水平随时代发展不断推向新的高度。

论坛宗旨:生态危机全球化的态势下,生态安全已成为全球性的最终安全以及全球政治稳定与发展的重大环境基础。如何传承和创新生态智慧,破解生态安全与城乡发展过程中的难题,推动城乡协同建设与实践成为关键。本次论坛宗旨在于深入践行《生态智慧与生态实践之同济宣言》,进一步促进生态智慧理念在城乡高质量生态实践发展中的融入和落地,促进生态智慧教育发展以及生态智慧型公民的全面培养,加强生态实践过程中的公众参与;进一步建立以高品质生态实践为目标的多学科共同体;为国内外学者和实践者提供一个以生态智慧为核心的跨界交流、学习、共享与提升的国际平台,继续为传承和创新中华生态智慧与生态实践范式而努力!

我大段地摘录不是为了偷懒,而是为了让大家都切身感受一下,美学领域之外的学者是如何思考生态智慧的。如何将生态美学理论与社会生态实践结合起来,一直是我苦苦思考的问题。我真切希望生态美学是能够运用于社会实践的真正意义上的“实践美学”。

宋曦阳:就生态文学的判断标准问题而言,请问您在实际的生态文学批评和研究中,如何具体界定和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生态文学?特别是在面对文学作品中生态意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时,例如中国的乡土文学,其中普遍存在一些生态意识,但是又很难将乡土文学和生态文学划等号,您能否分享一些具体的标准或方法,帮助我们更准确地识别和评价生态文学作品?

程相占:判断通常需要标准,但很多判断在很多时候是根据感觉做出来的。我很难在这里列出一个标准的清单,让大家根据这个标准去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生态文学。我认为,生态文学可以最简单地概括为是以当代生态意识为主题思想的文学,难点是不同文学作品生态意识的明晰度差别很大。像《沙乡年鉴》《寂静的春天》这样的作品,生态意识非常明显,其明确地关注生态危机、表达生态关怀、借助生态学知识、具有浓厚的生态伦理意识——这里所说的四个要点,或许可以理解为你所说的四个“标准”,但像你所说的乡土文学,还有一些传统的自然文学,顶多只能说其具有一些朴素的生态意识,而不能直接认定其为生态文学。

宋曦阳:您在研究中明确区分了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并强调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态审美”,请问您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如何通过这种区分去深入理解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价值?您是如何将这种区分转化为具体的批评方法和视角的?

程相占:很抱歉啊,我基本上没有运用生态美学去进行文学批评,从来没有发表过文学批评方面的文章。龙其林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可以请教他。

李帅:您在《环境美学概论》中的“城市环境”一章讨论了城市环境的审美特性,其中频繁出现的是一种模拟游客心理的审美感受。即在讨论城市环境美学时,我们可以对道路、边沿等概念进行理论和抽象的描述,但在进入具体的案例分析时,最为方便直接、也最为扣题的则很可能是旅游景点。这是否说明当我们希望对城市环境进行美学描述时,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一种游客眼光?既然现实中的城市居民更常扮演的是“本地人”而非“游客”的角色,我们该如何以一种“本地人”的眼光对城市环境、城市生态进行审美?

程相占: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出如下一个设问:故宫或卢浮宫的工作人员,每天都与珍贵的艺术品打交道,他们每天都在进行审美欣赏吗?他们会不会也有一种“审美倦怠”?前不久我正好跟一个朋友讨论了一个问题,我将之称为“审美新奇感”。新奇往往是引起审美注意、引发审美体验的诱因,其反面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审

美疲劳”，而是“审美倦怠”。也就是说，即使面对审美价值很高的事物，次数多了也会出现审美倦怠的情况，因为过于司空见惯的事物，通常都会被视作寻常之物，难以引发审美注意。作为游客的外地人，通常是浮光掠影地观赏各地景色。针对这种情况，现在有种说法叫“深度游”。也就是说，游客要放慢旅游观光的节奏，沉浸在一个地方的生活中，深切地体会当地的风土人情。用生态批评的术语来说，就是要体会一个“地方”的“地方感”。要想真正地懂得一个城市，比方说北京的“京味”、广州的“广味”，那还得多向本地人请教。只不过，也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苏轼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本地人反倒不容易反思自己最熟悉的事物。简言之，用心细品、深入反思、对照比较，都有助于我们获得更加丰富的审美体验。

李帅：选择成为“游客”（不论想象还是现实），不仅意味着对异托邦的进入，更意味着对日常链条的暂时逃离，请问您这一由城市环境审美讨论引出的问题是否在生态文学或生态批评的关切范围之内？如果在，又应如何在生态文学批评的框架下对这一问题进行把握？与之相对应的问题是，生态文学应如何进一步挖掘城市这一人口众多、状况复杂的生态场域而不流于简单重复的工业污染批评？

程相占：我刚刚提到了生态批评中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地方”（place），一个是“地方感”（sense of place），这里还可以补充第三个，即“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一个城市当然也是一个地方，“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现实造成了严重的“无地方性”，当然可以用生态批评来进行研究。我认识一位青年学者名叫马特，她与宋燕鹏合著了一本《城市生态批评理论研究》，202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你可以找来读读。很多生态文学作品都是以自然为题材的，以城市为题材的生态文学作品也有。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城市生态学”（urban ecology）早就诞生了，其有助于我们将城市理解为一个生态系统，加深我

们对城市特性的理解，思想深刻的文学家或许可以从中获得创作灵感。城乡差别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生态批评当中的关键词“环境公正”。我想，生态文学要想写城市题材，也就是说要创造城市生态文学，不妨从无地方性、城市生态学与环境公正这三个关键词出发展开思考。

李帅：当下经常出现有关“文学破圈”的讨论，以此作为参照，请问您生态文学与批评是否有“破圈”的需要与可能？如果有，未破之前属于生态文学的“原圈”与边界在哪？这一“破圈”动作是否有一具体的方向与方法？在“破圈”过程中又会遇到哪些障碍？

程相占：当前社会流行各种各样的“圈”。我作为大学老师，主要待在“学术圈”。生态批评肯定是学术圈的事情，要破圈很难，但生态文学作品就不同了，不仅仅是学术界的学者在研究，其传播范围遍及全社会，很难说有什么固定的圈。我想你这里提出的这些问题，深层意思是想讨论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全社会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生态素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我认为，要做到这些，前提肯定是提高生态文学的质量，让它传播得更加广泛。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假如某位生态小说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这算不算你这里所说的“破圈”呢？

参考文献：

- [1] 曾繁仁. 生生美学具有无穷生命力 [N]. 人民日报, 2017-10-20(17).
- [2] 程相占. 中国古代文心论的现代阐释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23: 341-342.
- [3] WANG X H, CHENG X Z. Contribution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to Urban Plann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ety Systems Science, 2011, 3(3): 203-216.
- [4] 程相占, 高伟. 营境以致善境: 生态美学与善境伦理双重视野下的城市规划 [J]. 城市规划, 2024(4): 27-30.

责任编辑：黄声波